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雄·汉武大帝新传



何新是名震中外的著名学者。

其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方面的

研究早已素为人知。

他在中华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

更为独树一帜。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收入近二十年来

何新研究古学的全部重要著作。

何新认为：中华乃是“日华”贵胄。

源世之论，石破天惊。

欲寻民族文化之根者，

不可不读这一套千古奇书！



何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27.341

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雄·汉武帝新传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汉武大帝新传 / 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I. 雄… II. 何… III. 汉武帝(前 156~ 前 87)—人物研究 IV. 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07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本书印张: 13.75 本书字数: 24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 236.5 全套书总字数: 4100 千字

全套定价: 680 元 (15 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为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本书对汉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历来难解之疑谜给予了解析。58集电视剧《汉武大帝》，是作者授权江奇涛先生使用作者这些研究成果根据《史记》及《汉书》，构思创作的。

本书诸篇初稿都曾在《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及《香港商报》“何新异论”两专栏发表过。原曾收入《圣与雄》*一书。此次新版，作者修订了一些讹误，并补充了一批新的史料。是为序。

何 新

2004年10月12日记于京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毛泽东论汉武帝

“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 1957 年 6 月 17 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 20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目录

001/ 总序·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004/ 序

001/《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003/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006/ 董仲舒与武帝之元光决策

009/ 焚书坑儒及秦汉之际意识形态转型

014/ 今古文经学分野与汉初政治斗争(今文经学之兴起)

019/ 今古文经学分野与汉初政治斗争(今文经学之兴起)

024/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031/ 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

038/ 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稳步己之诏

046/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

063/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073/[附录]匈奴单于世系表

076/[附录]匈奴哪里去了

079/[附录]论汉武帝

085/[附录]汉武帝年谱

210/ 何新著作年表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 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 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戚。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

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 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羨。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向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①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

^①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

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 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拔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 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之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

人。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是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董仲舒与武帝之元光决策

1

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二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的建立。二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措施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隆虑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史称这一系列新政为“元光决策”。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2

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历来论者多将董仲舒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而我则以为未必然。董仲舒反对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耕小农的利益。《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上武帝书云:“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罪徒)充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他的建议是,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兼并田地。“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业僮仆,皆入之于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庶民知识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汉武帝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从庶民中出身的一个“士”阶层,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贬抑和削弱横行不法的诸侯贵族、大地主(豪强)和大商人。其政策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显色彩。

3

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戒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纒纬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威权。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建议。但是对董仲舒其人,刘彻却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刘彻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

但数年后,淮南王与田蚡政变的密谋暴露,证明董仲舒对田蚡的指责是对的。武帝表示歉疚,又派董仲舒的两位学生根据《春秋》经义审治刘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不识时务、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迂夫子。

董仲舒是孔子以后,自秦汉至清代二千年间,对中国政治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汉学者刘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刘歆亦云:“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但是,在现代,他所受到的误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